

特稿

从点状拉动到组团式发展： 未来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思考*

牛文元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摘要 为实现 2020 年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因此国家发展形态的选择应有新的构思,并在战略高度上实施新的突破。由前 20 年的“点状拉动”向后 20 年的“组团式发展”演进,正成为历史性的必然。

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Development Divident)中索取的成熟条件。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七大类区域整体优化的综合结果。研究表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

未来 20 年大力推进与重点培育我国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约束“瓶颈”的操作手柄,这种最大限度分享“发展红利”所带来的台阶式跃进,必将成为引领中国发展势头的战略制高点,成为保障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关键词 发展红利,发展战略,组团式发展,中国三大城市群

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大连、青岛、宁波、广州等 14 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同时以天津、重庆、沈阳、西安、成都等中心城市为龙头的近 50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为代表的几十个国家级



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9.5%,经济总量提前

优化投资硬环境和完善投资软环境,坚持以引进外资、兴办项目、加工出口产品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在推行改革、对外开放、吸引投资、大胆试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 2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

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国家特定政策的扶持下,注重

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9.5%,经济总量提前

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应对新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为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国家经济发展形态的选择必须有新的构思,并从战略性的高度上实施突破,由前20年的“点状拉动”向后20年的“组团式发展”演进,这种历史的必然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也是改革开放前期成功经验的有效放大,同时这也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布局和新思维^[1]。

1 “发展红利”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带根本性的依托。

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Development Divident)中索取的成熟条件。发展红利是指“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5)大中小城市功能的互补程度;(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随着区域整合规模的有效扩大,发展红利呈非线性增长趋势。研究表明,地理范围线性扩大的同

时,它所创造的“发展红利”呈非线性增长^[2]:

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3]。

以上所引述的定量表征将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即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要着眼于产业结构(一、二、三产业)的调整,更高级的具有台阶式提升的结构调整是为获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红利”所进行的区域空间调整,部署和培育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就是为了获取发展红利这个新型动力源,并以此作为达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

2 构建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放大发展红利的有效载体

城市是先进生产力的集聚中心;城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市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归宿。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城市体系的整合和组团式结构的形成,是汲取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的城市化进程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全球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而城市

化中的制高点表达就是组团式拉动的城市群。

纵观我国城市化50年演替的历史轨迹,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重点、格局、成效,将对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战略性的作用。中国经济将从原先的“点状拉动”(单个点状城市)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群的“面状组合”(组团式拉动),特别是向珠江

地理尺度(km ²)	生产力要素	专业化分工	发展成本	发展红利
10 ⁰ -10 ² (乡级)	极不完备	极差	很高	10 ⁰
10 ² -10 ³ (县级)	不完备	很差	较高	10 ^{0.5}
10 ³ -10 ⁴ (地级)	较完备	较差	平均	10 ¹
10 ⁴ -10 ⁵ (省级)	良好	强	明显降低	10 ²
10 ⁵ -10 ⁶ (跨省)	很好	很强	很低	10 ⁴
10 ⁶ -10 ⁷ (国家或洲级)	极好	极强	极低	10 ⁶
10 ⁷ -10 ⁸ (全球)	超好	超强	超低	10 ⁸

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这三个大城市区(群)进行集聚。可以预期,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健康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空间。

21 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还可由以下的统计数字表明:20 世纪下半叶美国 GDP 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达到 67%;而日本 GDP 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超过 70%;就中国而言,珠江三角洲的 GDP 目前约占全国的 10%、长江三角洲约占全国的 18%、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约占全国的 7%,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仅达 35%。美国、日本、中国的对比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主力军尚未形成,发展红利的巨大潜力远未释放,组团式发展的强力拉动有待开掘,空间整合的优化能力亟需提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日本三大城市群的集聚能力和 GDP 贡献率达到整个国家的 2/3 以上,而中国三大城市群对全国 GDP 的贡献率只有 1/3 强^[5]的主要原因。

全世界都公认,未来 20 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特别要重点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的操作手柄,应当成为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最大限度地分享发展红利带来的好处,加快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从点状拉动到组团式发展的重大转变,打造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构筑引领中国发展势头的战略制高点,将是未来 20 年中国经济改革必然面临的历史选择。

3 发展红利成功溢出的五大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平均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 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 75%,中等收入国家为 60%,低收入国家为 28%,而中国城市化率还不到 30%,与低收入国家相近,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三十个百分

点,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差更远。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成为严重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成为快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集聚的“巨大瓶颈”,成为束缚发展红利有效释放的“巨大瓶颈”^[6]。未来 20 年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的组团式城市群建设,正在成长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担当着激发区域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为支撑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经过全力扶持与重点培育,未来 20 年中,中国三大城市群发展红利效应的成功溢出,将使其产出对于国家 GDP 的整体贡献率由现在的 35%—38%上升到 65%—70%,大大减轻国家其它地区的发展压力,与世界经济大国著名大城市群(区)的产出贡献水平大致相当。对比而言,中国三大城市群建成(发展红利充分溢出)的五大标志将体现为:

人口密度从现在的 750 人 /km² 达到 2 000 人 /km²;经济密度从现在的 3 000 万元 /km² 递增至 1.2 亿元 /km²;资本密度达到现有投资额的 2.5 倍以上;消费密度达到现有社会零售总额的 3 倍;各类网络密度将实现快速交通、管道设施和通信光纤等 5—10 倍的跃增。

为了动态评估和实时调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释放能力,即定量评价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强度和发展质量”,将根据各组团式城市群的区域特点、发展历史、基础实力、发展潜力、外部牵引和内部动力等要素,设计出由五大支持系统组成的评价体系,既能对区域整体发展,也能对区域内部差异做出科学、合理、规范的比较。五大支持系统分别为:

城市群基础实力(发展基础);城市群竞争能力(发展潜力);城市群保障能力(社会进步);城市群管理能力(制度创新);城市群可持续能力(环境与发展的平衡)。

每一个支持系统之下包括若干状态模型(共约

20 余项)和基础要素(共约 100 余项),作为定量评估和动态监测组团式城市群发展的应用工具。

4 组团式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 GDP 达到 1 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能力将步入一个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 GDP 总量在达到 1 万亿美元(10 100 亿美元)以后,头 10 年的 GDP 总量达到 2.7 万亿美元(27 080 亿美元);日本的 GDP 总量在达到 1 万亿美元(10 480 亿美元)以后,头 10 年的 GDP 总量达到 2.4 万亿美元(24 251 亿美元);中国的 GDP 总量在 2000 年达到 1 万亿美元(按汇率计算),依照国家计划在其后的 10 年(即 2010 年)预计翻一番将达到 2 万亿美元。

为什么美国在达到 1 万亿美元台阶后,用了 10 年的时间使得 GDP 增长了 1.7 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 1.4 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他们少增长 0.7 万亿至 0.4 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 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 64%,而中国在 2000 年的城市化率仅为 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 21 世纪的头 20 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组团式城市群建设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降低发展成本、挖掘发展红利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4]。2001 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撰文进一步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为建立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组团式经济发展模式,真正从发展红利中获取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必须切实完成四项根本性的转变:

(1)重点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2)重点实现民间储蓄向民间资本的转变;(3)重点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4)重点实现农民

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同时,必须着力提高和优化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环境、生产要素、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管理体制等五项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政府重点导向、经济快速发展、资本高度密集、基础设施先进、高新技术主导的全球竞争能力、释放出发展红利的巨大潜力、对外高度开放与投资环境优越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

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打造必须依据各自所具备的物质经济条件、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沿革特征,从点状拉动向依托中心城市的组团式发展转型,充分发挥大城市群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作用,以大、中、小城市的等级有序、产业分工和合理互补为组团式结构的核心,以快速流畅的交通网络为区域发展轴线,按经济水平、产业布局 and 城市化水平,将地域空间划分为人口、经济、资本、消费和公共服务设施依次递变和有序推进的发展圈层,根据现状城市布局及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趋势,重点完善组团内部功能和实施全新的产业链设计,进一步强化组团式的空间等级化、发展一体化,达到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区域效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可以考虑欧洲联盟的政经架构方式,在三大城市群实行独特的制度创新和特别的经济政策,放大和提高前 20 年经济特区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进而实现三大城市群中“行政区划、经济区划和生态区划”的有效融合。

5 个例分析:珠江三角洲战略目标函数制定

战略目标函数的制定,必须依据珠江三角洲发展红利的内在禀赋以及在全国和区域中的定位和功能,其中由近及远应特别考虑以下三大背景:

与香港、澳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联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循环。

以上三大趋势必将为珠江三角洲的未来发展潜力与发展动力提供难得的战略机遇,加之珠江三角洲有成功的改革经验和特区的巨大优势,在制度创新、结构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四大方面有丰富的实践,因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的目标函数必须在更高层次和更宏观的视角加以明确,并对此作出强有力的论证。我们认为: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应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增

长的三大战略平台之一,对于全国 GDP 的贡献率,将由 2001 年的 10% 提高到 2010 年的 20%,即从总量上翻两番达到 4 万亿人民币,这比全国的经济总量翻一番(达到 20 万亿)的速度高出 1 倍,为此,必须从整体战略层面上实现“五大集聚效应”:

(1)人口密度的集聚效应:将从现在的 550 人/km² 增至 1 000 人/km²,平均提高 1 倍,总量达到 4 千万人,人均 GDP 达到 10 万元(约 1.2 万美元/人,按汇率计算);

(2)经济密度的集聚效应:从现在的 2 500 万元/km² 递增至 1 亿元/km²,满足达到 4 万亿人民币总量的要求;

(3)资本密度的集聚效应:在保持外资吸引持平的条件下,民间储蓄向民间资本的转换总额约为现在的 2.0 倍;

(4)消费密度的集聚效应:达到现有的社会零售总额的 2.5 倍;

(5)网络密度的集聚效应:快速交通、管道设施、通信光纤等,实现 5—10 倍规模的扩张。

在上述目标函数的总量控制下,2010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信息化程度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信息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 20%,预计互联网络用户数将超过 2 500 万户,电话普及率达 100%,每千人拥有计算机 400 台;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增加到 2 200 公里,电源总装机容量达 4 864 万千瓦,新建天然气供气网 509 公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未来 7 年内保持平均 18%—20% 的增长速度,到 2010 年达到 1 万亿元;出口总额将保持年均 8% 的增长速度,在 2010 年达到 2 000 亿美元。

探讨珠江三角洲区域规划中合理的目标函数,以及为实现这一组目标函数设计出相应的资源配置、产业链布局、城市群功能定位、区域潜力发挥、发展红利获取等,进一步做出具体的、可操作的部署。

主要参考文献

- 1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2002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 2 牛文元.理论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 Niu Wen-Yuan, W.M.Harris. The Forecast of China's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Its Sustainability before 2030, Futures Research Quarterly, 1997,13:5-27.
- 4 中国市长协会.2001-2002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 5 路甬祥(主编),牛文元(执行主编).21 世纪中国面临的 12 大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 6 李政道,周光召(主编),牛文元(执行主编).绿色战略.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

牛文元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家高技术计划(S-863)软科学研究战略组组长。2002 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62 年大学毕业,1966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兼职教授,耶鲁大学 SDLP 计划讲席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杂志编辑委员会主任。发表学术论文 209 篇,近 10 年在美国、日本和国际杂志 *SCI* 核心检索刊物上发表 35 篇,出版学术专著 15 部。曾获国家发明奖 1 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